

专栏 Column

责任编辑:沈飞昊 美编:蒋玉磊 2006.12.9 星期六
邮箱:flyhow@ssnews.com.cn 电话:021-38967626

■思想

讲道德的经济向“纯经济人”说不

——循环经济随笔之九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发展战略处处长

前几年,有一句话非常流行,即“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就笔者所知,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巴曙松博士。但使之广为流传的却是笔者的另外两位好友——赵晓君和钟伟君,他俩以此为题各写了一篇被各类媒体广为转载的杂文,以至于几乎每个经济学人对此都耳熟能详。说市场经济是“无耻的”,确有一定的依据。经典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是,人都是“经济人”。每个人从自私的本能出发,在市场经济“一只无形之手”的作用下,最终却能使人类社会总体福利提升。

正因为如此,“彻底的经济人”认为,市场“不相信眼泪”,是不道德的。国外有调查表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在日常行为上都比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缺乏利他主义精神。而经济学教授,相对于其他专业教授而言,也更不愿意为慈善事业捐赠。在他们看来,如果能以经济

学知识为自己挣更多的钱,按经济学原理推断,无形中也就是“为人类作了最好的贡献”了!

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发现某银行只将优质服务提供给高端客户,千万别气闷,因为这家银行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很可能就是一位“彻底的经济人”。熟悉银行业务的人都知道,能够给它带来80%利润的是仅占全部客户20%的黄金客户,而剩下的80%的客户却只能给银行带来20%的利润。银行家们当然有理由只对少数人笑脸相迎,而对其他人“公事公办”。尤有甚者,某国外银行在中国开办外汇业务时,竟然规定日均存款低于5000美元的客户每月需向银行倒付6美元的服务费!

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度,通过一些夸张方式来宣传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利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以推动市场改革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9.5%,既超过了日本历史上增长最快的20年(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7.6%左右的平均增幅,也超过了韩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20年(60至70年代)8%左右的平均水平。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四,贸易总量进入世界前三,外汇储备即将跃居世界第一,并且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美国共同

构成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子星。

在形成中国奇迹的多种因素中,市场观念的快速普及无疑是重要的前提。然而,如同辩证法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无耻的”市场观及其相对应的财富观确实有利于极大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利于整个经济效率的快速提高。但是,从长期看,片面强调经济效率,必然导致社会失衡的现象日趋严重,出现吴敬琏老先生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在“坏的市场经济”里,巨大的社会差距不仅不能成为人奋发向上的动力,反而是人们想尽办法掠夺他人财富的诱因。

“坏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不是简单的财富转移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公平问题,而是把整个蛋糕变小了。终有一日,资源被切割殆尽,市场全面崩溃,

这已在历史上的多个经济危机中得到印证。查查历史,30年前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有24个,20年前则有28个,现在依然是28个。原因无它,只因20多年来再没有任何经济体成功地迈过“坏的市场经济”陷阱。

眼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坏的市场经济”的事例可以信手拈来。比如说,河南郑州市的几级政府的所谓“馒头办”为了争夺对馒头商的管理权竟发生争执,某地乡党委竟下文件免去了一家私营企业的总经理并任命了新的总经理,缺乏有效制衡的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造就了无数的“三无”农民……

很显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若仍继续以“经济人”自我定位,继续推行“无耻的市场经济”,就会在“坏的市场经济”道路上越走越远。循环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公平与效率的结合。而且,其中的公平不仅是指代内的公平,同时还指代际(即不同代人之间)公平。在传统经济模式下,自然生态系统只是被视为经济系统的一个辅助支持系统。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经济系统则被置于人类生态

系统之中,成为后者的一个衍生子系统。因之,循环经济对人有三重意义:首先,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构成单元,他是一个自然人,他的一切活动都不能破坏他所在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否则,他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其次,他是一个社会人。作为这一系统中唯一具有思维能力的生态单元,人是唯一有能力对这一系统负责的主体。他可以用自己有意意识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因而对自然界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最后,在履行完自然人和人社会责任之后,他是一个经济人,才可以“自私地”来为自己谋福利。

主张“无耻的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人”只强调经济效益,只管自己,只顾眼前。至于身后是否洪水滔天,则不在其考虑之列。而“循环经济人”则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同时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当三者不能兼顾时,则取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舍个人短期的经济效益。

从这个角度看,循环经济是一个道德人,循环经济也是讲道德的经济。

■失在弦上

不仅仅为了“体恤百姓情绪”



◎章剑峰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香港财经文摘杂志高级记者

亚洲楼市过热,韩国未能幸免。由于调控失策,加之一些官员不负责任的言论激怒了舆论,青瓦台主导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部分高级官员新近为此纷纷引咎辞职。为了改变那种“根本就不体恤老百姓的情绪”的形象,青瓦台不仅向公众道了歉,还承诺将把工作重点放在以低廉价格供应大量高质量住房上。

去年,我在北京接触到了一些韩国地产商的融资中介,他们一直努力要将中国资本引入韩国楼市。从今年夏天起,中国有了严格约束外资的规定,以防止大量热钱肆意入市。更早些,中国已经着手整顿楼市投机、炒作为行,决意将其中的一些资本驱出。韩国同仁从中看到了资本路径转移的可能。

韩国对境外资本没有过多设限,外国人不仅可以到那里去买房置业,甚至还可以投资购买土地等不动产。也因为韩国市场近十年间吸纳了过多的热钱,导致一些城市可供用地越来越少,地价出现历史新高。昂贵的高档物业大量出现和被复制。

虽然青瓦台很早就着手调控市场,但几乎没有什么收效。原因在于主导调控政策的官员无所作为,甚至成为市场的既得利益者和投机势力的一份子。总管理房地产政策的官员一边私自贷款购房,一边公开声称“我不是房地产专家”,政府失信于民,执政形象大受损害。

这段时间,国人一直在呼吁政府应该让那些在调控楼市时无所作为的官员引咎辞职,这种呼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行政处分放大了政府的权力作为和官员的自不觉这两者的差异。行政处分的施予方和被施予方往往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打击关系,只有通过打击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官员的追究若不强逼到底,不负责任的官员就可以不主动领罚,甚至明知故犯、知错不改,哪怕面对汹汹舆情,也会安之若素。

如此一来,调控政策便冒有极大的反弹风险,由于官员通常会通过嫁接行政手段的方式将个人行为摇身一变成为政府的公共治理举措,不通过问责机制几乎难以破除这种权力壁垒。我们很难看到那些没有建设保障住房、鼓吹楼市繁荣的官员被确立为行政处分的“打击对象”。

就此而言,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定义行政处分的适用范围和界限,非法大面积批占土地应该给予行政处分,小面积的批占同样要整伤,因为性质同样恶劣。尤其对于牵扯到社会和经济稳定的高房价问题,在官员不作为、假作为时,行政处分必须适时启用。

随着问责机制的确立和完善,行政处分在经济建设领域将会被广泛采用。但我们还要看到,完全通过行政处分难以达到理想预期,只要自上而下的打击关系局限在某些点上且是偶尔进行,不作为官员就有侥幸免责的机会和空间。而引咎辞职未必是“体恤老百姓的情绪”的体现,但这种模式无疑更能使人体会议意先行的重要性,更能强化官员的民意认同感,同时也能提升官员的执政品行。

如果一座城市里近三分之二的公众都认为房价过高、收入比不合理,为了免除失信风险,主导这方面事务的官员就应该为此担责,在没有受到行政处分时就引咎辞职,或被劝退。这样,一方面可以显示官员自身的觉悟素养;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有助于增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治理的形象。

■芳草斜阳

金融是战争的另一个战场



◎丁骋骋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战争可能不会轻易地摧毁一国的金融市场,但金融市场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战争的成败。

1568年,为了反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限制宗教和自由的专制统治,尼德兰北方数省,在威廉亲王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而此同时,荷兰的金融市场已经萌芽并获得发展,几个标志性事件是1602年成立世界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1611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尼德兰革命主要集中在一些工商业城市,富有商业头脑的荷兰人此时将他们的商业天才也充分地展现在战争中,他们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为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并用来为政府筹措军费。

在荷兰的中心城市,金融家提供有息存款、汇兑结算和发行债券的服务,并尽力想办法保持币值稳定,确立良好的信誉和定期偿还债务的原则,有这样一个金融市场,政府可以用比其它国家优惠的条件借到资金支持军队,这使得荷兰军队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1621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后,荷兰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甚至变成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虽然军队开支不断上升,政府为筹措军费而背负的债务也节节上升,到1651年达1.53亿佛罗林,然而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良好的偿债信誉使荷兰的金融体系从没出现过危险。恰恰相反,国内的金融市场因为战争筹措经费的需要变得更为活跃,资本的集散中心阿姆斯特丹由于良好的运作和便捷的交通,可以向外国政府认购各种期限的债券而成功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战争考验了荷兰,却使西班牙陷入财政亏空的泥潭,战场上一再失利。1648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继承人承认联省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欧洲国家为了支付其庞大的军费开支,都发展了一套复杂的银行和金融体系。18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的战争开支,几乎有四分之三来自借款。是战争给了欧洲的“金融革命”以最大和最持久的推动!

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由于在欧洲大陆的争夺而打了4场战争。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是当时欧

洲军事最强大的国家,然而英国在金融体制上却比法国拥有更大的优势。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和各地随之建立的“乡村银行”,以及繁荣的债券交易市场,为伦敦开辟了广阔的财源。而英国高效和守信的财政体制,又使政府能够持续地筹措到长期贷款,同时负责定期地偿付本息。结果,英国借款利率不断下降。1752年,英国政府的国债利率大约为2.5%,而法国是5%左右。18世纪中期,英法两国的国债数额几乎持平(约2.15亿英镑),但法国每年支付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国的两倍,沉重的军费开支使巴黎出现财政危机,更多发行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由于国内没有一个较好的金融体系支撑,法国只能长期依赖荷兰的金融市场融资,尽管能够接受利率较高和苛刻的条件,波旁王朝也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法国军队,这样在军事实力上渐渐落后于英国。1756年至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的战火从欧洲一直蔓延到北美和印度,法国惨败,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势力都被英国逐出,从此丧失了欧洲最强国地位。

与英国相比,法国5%的国债利率已经很高,但旧中国在1930年之前的政府,压根儿就筹措不到军费。以1894年甲午海战为例,日本在政府和媒体的鼓动下,上至天皇下至妇幼纷纷投入到“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中,而中国北洋水师也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户部的拨款,慈禧太后却为了操办六十大寿挪用北洋水师2400万军费。甲午海战,清兵用掺着沙子的炮弹去炸敌人的铁甲战舰,当时号称“远东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顷刻间化为乌有。历史当然容不得假设。晚清政府不要说金融市场,就连起码的金融意识都没有。甲午海战后的1898年,清政府第一次发行公债“昭信股份”以解决财政困境,目标是1亿两白银,但几个月后仅募集到十分之一,被迫放弃。当时的国人从上到下,都认为借钱来化是是无法接受的一件事。然而,没有钱,怎么可能赢得战争!而没有一个好的金融体制,又怎么可能为战争融得足够的经费!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光是《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清政府被迫赔款达6.5亿两白银。整个晚清政府被迫赔款一共达16亿两(不包括利息)。如果清政府能按5%的利率率从本国融资,而且从每年1亿两银子的国库拿出半来支付利息,那么清政府至少还不致于破产。金融市场缺乏,国库空虚,清政府只能以国土和主权作为抵押,于是大片国土被奉送和租让,最后连关税也被作为抵押,主权一步步地丧失。

该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悲剧揪眼泪的不光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也该有更多的反思!

■长短集

解读中国富翁基因密码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与去年最大的不同,是单个富翁持有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前百名富豪总财富较上年增长45.5%,达到了4827.63亿元人民币。上年第100位富翁的财产是16.12亿元人民币,而本年第100位富翁的财富就达到了24亿元人民币。

如果说,在美国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能造就一个富翁的话,那么在中国,20年就可以塑造一个亿万富翁。尽管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富翁们“第一桶金”的来源,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大多数富翁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但财富向个人迅速集中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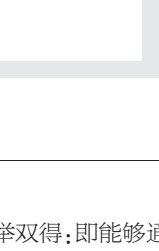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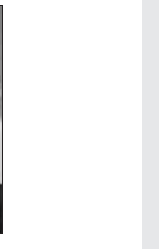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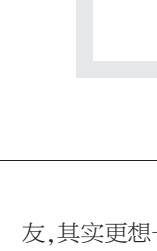
如果从致富的阶段上看,改革开放二十年间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政府花了大力气在流通领域的市场化建设上,一批待业青年,甚至是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群体以早期的个体户形式迅速加入其中,由于其收入具有非固定性的特点,造就了中国内地第一批高收入群体。第二阶段是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此时时期,中国经济运行有一特殊的价格双轨制现象——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同时运行,客观上就给一批人留下了“倒腾紧俏物资而牟取暴利”的机会,最终形成了中国第二批高收入者。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初到末,这是金融领域市场化快速发展期,伴随着金融债务、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中国诞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他们当中首先是上市公司高管和职工,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其次是上市资格的审批者;再次才是部分股民。新世纪初至今正处于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出现了明星(知识明星、体育明星、演艺明星)、房地产大亨、国企收购者三类富翁。

如果从致富的原因上看,乃是源于改革引起个人收入渠道的拓宽,大致包括四种:第一,传统按劳动或按要素的收入。除

劳动所得以外,还包括资本利息所得、经营者的才能报酬等。例如,一些人在满足需求以后,节约了一大笔剩余财富,将之以存款形式存入银行得到了利息收入,这就是相对于货币资本的报酬;再如,一些私营老板、业主通过辛勤创业、管理有方而得到的利润,除去所有的成本支出以外,其它的所有剩余可以归入经营者才能的报酬。第二,市场波动性收入。这种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一种形式是投机收入或者说风险收入,它是人们承担很大的风险为代价,如炒股、炒房地产、风险投资等。另一种形式是彩票收入。这类收入虽没有大风险,但随机性更大,中奖率很低。第三,权利型个人收入。这种收入是引起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比如,垄断收入,这里的垄断特指凭借自身的实力(技术水平高、规模经济显著等)而获得高于同类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现实中,同一行业企业间收益差距的拉大是普遍存在的。再如,利己性权利收入,或称之为权利寻租,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或其子女凭借权利经商、筹资等所获得的高于没有权利的人的超额收入。第四,违法性收入。这与前三种收入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通过违法手段而牟取的暴利性收入。如政府腐败官员的贪污收入、制假售假、走私、卖淫等等。这种收入往往只是极少数的收入来源。

再清楚不过,中国所谓的富翁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他们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出现的,他们本身不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初,一夜暴发不是奇迹。在一个草莽或江湖式的发展环境中,一些企业家、准企业家和伪企业家(大型个体户)确实表现出某些方面的出众才能,但在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阵营不仅在财富积累的能力上会继续分化,也会在个人的道德素质上产生分化。这些年来,此类荣辱一瞬间的故事真是太多了,比如曾经显赫一时的牟其中、李经纬、马胜利、步鑫生等等。

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但在瞬息万变的急流中也使得一些人经受不住各种诱惑而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在一年一度的财富榜热闹过后,不断增添新面孔的中国上榜富翁们不能持久地经受住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他们之中能否也为世界贡献盖茨那样的财富英雄,恐怕是大家分外关注的。



■彼岸

理念也有自由竞争市场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
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年底前是美国大多数报刊杂志续订之时,我连续收到几家杂志的续订通知,里边还附上几份礼品订阅表,时间上衔接得也正好,正是准备圣诞节礼物的季节,可以将一年的杂志订阅作为圣诞礼物。从两年前开始,我就订阅杂志送朋友,朋友很喜欢这样的礼物。其实,作为订户,我可以在网上下载我订阅的全年版杂志,也完全可以将下载的杂志从网上寄给朋友,就如将印刷版杂志通过邮局寄出去

一样。那样既方便又节省,为什么非得要花钱为朋友订阅印刷版的杂志呢?

再进一步,即便我不是订户,我也能从杂志的网站读到许多很及时的文章。比如,保守的半月刊《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在网站上了一个免费的在线网刊,摘选一些杂志上的文章,更有许多新闻评论。如果仅仅为了获得信息,我也无需订阅这些杂志。

我订阅《国家评论》是因为我有对该杂志的需求,这种需求也远不只是那两个星期寄来一次的杂志,而是它所传播的理念。因为《国家评论》能更多地反映我的理念,我希望这些理念能够让让更多人分享,能够去影响美国的政客和政策,我愿意《国家评论》能够赚钱,能够付得起编辑、记者以及作者的工资,我愿意花钱订阅这本杂志,我订阅这份杂志作为礼品送给朋

友,其实更想一举两得;即能够通过杂志所代表的理念去影响我的朋友,又能够对杂志有更多的支持,因为《国家评论》等杂志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向顾客提供理念作为产品,所以不会过于担心他们忠实的订户会看他们的杂志。《每周正言》(Weekly Standard)是我订阅的另一份周刊,它将过去十年的杂志全部放在网上,订户可以在网上下载,其用意就是让他们持有的理念可以更广泛地传播,而不用担心失去订户。虽然这些杂志对自己的忠实订户怀有信心,但他们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杂志的内容必须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满足订户的需要,这显示了与政府资助的媒体的极大不同。

除了《国家评论》那样的杂志,美国许多受民间资助的智库也有类似的特点,尽管许多美国人在捐赠智库,但这并非完全是不用回报的慈善行为,那些智库需要代表捐赠者理念去影响公众和政府。我支持“传统基金”,就因为这家智库所倡导的减

税、小政府的经济理念等符合我的理念,我愿意支持他们以这样的理念去影响公众和政府,从而这样的理念能够应用到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之中。美国的自由、保守两大派在华盛顿都有资金雄厚的智库,就是为了以各自的理念去影响政府的政策。如果再扩大一点来讲,自由竞争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美国的选举,参加选举的政治家就是要把自己的理念拿到自由竞争的市场上,选民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自由选择,民主党更多地代表自由派的思想理念,大多自由派就选民主党的候选人,同理,保守派大多把选票投给共和党,因为共和党有更多保守派思想理念。

自由竞争是一个体系,它并非只适用于企业之间,产品之间的市场竞争,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人在理念上的选择和争辩。商业上的竞争可以创造出好的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在理念的领域里,自由竞争也可以给社会带来更顺民意、更公平、更有效的社会环境和机制。